

文化建构文学史纲

魏晋——北宋

林继中 著



北京大学 出



文化建构文学史纲

魏晋——北宋

林继中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建构文学史纲:魏晋—北宋/林继中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4

ISBN 7-301-08635-0

I. 文… II. 林… III. 文学史-中国-魏晋南北朝时代~北宋
IV. I209.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05075 号

书 名: 文化建构文学史纲(魏晋—北宋)

著作责任者: 林继中 著

责任编辑: 思成

标准书号: ISBN 7-301-08635-0/I·0715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网 址: <http://cbs.pku.edu.cn> 电子信箱: zpup@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022

排 版 者: 北京军峰公司

印 刷 者: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90mm × 1240mm A5 9.75 印张 300 千字

2005 年 4 月第 1 版 200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4.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林继中，漳州人。1967年毕业于福建师范学院中文系，1982年于厦门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导师周祖谟；1986年于山东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导师萧涤非。现任漳州师范学院教授，福建师范大学、河北大学博士生导师。

序 一

赵昌平

与继中君相识,还是因缘于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他的古籍整理大著作《赵次公杜诗先后解辑校》,当时颇感佩于他旧学功底的深厚,不愧为萧涤非先生高足。后来交往渐深,更知他能诗善画,书法迺丽有古风,是一位今天已不多见的大雅君子。也因此,约十年前,收到他的《文化建构文学史纲》中唐至北宋部分时,甚为诧异。当时,学术界自 80 年代初开始的西化热浪已经退潮,甚至被讥为浅泛无知,而他竟仍然坚持着用这一有些“犯忌”的书名而不理会师友中人改题的劝告,可谓事出意外。转而一想,大凡真正的读书人,必有一股倔劲儿,当众人趋鹜之际,未必随俗;而至举世皆非之时,却往往背时依前,以见独立不羁的精神。这在继中也是有迹可循的。就说他的书体吧,不就在法度森严中透现出一种狂放的气质吗?又是一个十年过去了,不意又收到了他的同题著作魏晋至盛唐部分。这次我才真正感到,事情并非那么简单。古人说“十年磨一剑”,而继中竟以先后近二十年的时间完成此书全编,可见他绝非意气用事,而是真正在呕心沥血地探寻着一条文学研究中的中西方法会通的道路。于是我终于怀着一种敬佩的心情,连同前帙,将全稿认认真真地读了一过。我说敬佩,是因为本稿连同书名,体现了继中的学术勇气,即寅恪老人所谓“独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我说认真,则是由于,尽管我现在未必有勇气如他般标而题之,但一直以来,我总认为,中西会通,是 20 世纪一切重大的学术思想成果的根本,也将是新世纪中国文化发展的主流趋势。以继中之功力,他的此一路向的研究,必有创获。

80年代那次中西碰撞之所以成果不彰,远不及“五四”前后那一次,原因不在中西会通路向的本身,而在于我们这一辈学人功底不逮,尤其是旧学修养难望前辈项背,这甚至比另一原因,外语及西学的“搭浆”更为主要。所谓穿靴戴帽,强中从西等现象,无不根源于此。继中是我们这一辈中旧学修养的佼佼者,这既得力于名师熏陶,更取自于闽中厚重的学术传统。这些,都已由《赵次公杜诗先后解辑校》作了最好的注脚。因此他确实有“资本”从事这项以中西会通之方法,梳理并建构民族诗学体系的宏大工作。而读罢全稿,我更深感,此想不虚。

回顾二十多年来古代文学史中西会通的研究,大抵有一个核心问题与三个影响最著的理论节点。一个核心问题是韦勒克、沃伦在《文学概论》中所提出的文学的外部因素是如何转化为文本内涵的。三个节点,一为文学的文化研究,二为文学的心理学研究,三为文学的语言学研究。目前的趋势则是试图将这分别注重于文化、主体与文本的三个方面融合起来。继中此稿正是此种趋势中做得较成功的一种。相对而言,新成的上卷,较十年前的下卷更为成熟,这是势之所至,也是他学术累积的体现。

我们尤其当重视上卷各章的布局与标题。第一章《土族文化的建构与文学》,可视作全稿的总论,提出了作者核心理论架构——文化史与文学史双向同构的观念,有云:

文化不仅是文学与客观世界或经济基础之间的中介,它与文学还是互涵互动的系统与子系统的关系。……文化的中介作用及其与文学的系统、子系统关系,最深刻地体现为文化自身的建构,制约、驱动着文学的建构,促成其演进;而文学又以其自身的变革参与文化建构,二者形成双向同构的运动。由于文化构型是随着经济基础和社会生活方式的变迁而变迁的,不断处于转型的运动之中,作为文化有机组成部分的文学势必随之运动。在整个运动过程中,文化整合作用是关键……

继中这一核心理论的意义,首先在于突破了数年前多以文化作为背景氛围的“历史文化背景”论的局限而由文化与文学之系统、小系统的互动关系着眼,通过文化目的、文化选择、文化心理的系列分析,将文化直接作为文学的因子来体认,从而避免了视文学为文化附庸的弊病,而对文化为文学内外部因素的中介说,作出了富于启发性的解说。其次,作为文学史研究者,继中更可贵地把握住了文学的本体地位。他进而以文质、雅俗、传统与时尚,个体与群体、创作与接受等文学内部因素,在文化目的驱动下的整合、因革、通变为主线,而以作者的情感结构”为文化与文学的交汇点,以文本的意象流变为归要,来展开自己对魏晋以来文学史演进轨迹的认识,从而如他所说:“使纷至沓来的文学现象呈现出一种有序的总体趋势”,其图式是:

由经济基础所决定的文化目的,通过传承、时尚及外来文化之影响,形成文化心理,同时作用于作者的情感结构与读者的期待视野,二者交汇于文本而共构作品,并因二者的交往而使期待视野发生演变,反过来又对文学进行选择与整合,形成以形式嬗变为标志的文学史运动(按:意谓演进)。

请尤其注意这段引文的最后一句——“形成以形式嬗变为标志的文学史运动”。这里的“形式”与“文化目的”、“文化心理”、“文化选择”相联系,也就呈现出结构主义文学批评所说的“有意味的形式”的品格。于是继中的理论构架,就不仅以文学的文化研究融通了文学的心理研究与语言学研究,甚至社会学研究,更以“形式嬗变为标志的文学运动”为落脚点,体现了这一融通之文学本位性质,这是他对于一般文学的文化研究的超胜处,而上卷二、三两章《生存焦虑唤醒文学》与《文学的独立战争》,更进而由“情志”与“语言形式”亦即意与辞,这文学的相互含摄的两端着眼,展开了对汉魏六朝文学史的解析,这又是他与仅以“情”的觉醒为汉魏六朝文学自觉标志的传统观念的不同处,而真正扣摸到了所谓“文学自觉”的真谛。关于这一点,我们还当仔细品味这两章各两节,凡四个小节的安排。

这四节以《情志的离合》(二章首节)起,以《酿造独特的语言形

式》(三章次节)结,中间为《人生诗意化的追求》(二章次节)与《培养独特的诗性思维》(三章首节)二节。这一架构隐隐透现出作者是以“诗意化追求”与“诗性思维”两个层次作为情志与语言形式之转换枢机的。同时,这一架构又与对魏晋至齐梁文学史流变的解析同步展开。总体写法颇接近于《文心雕龙》中《时序》以下数篇的论析;而涉及具体的文体时,又可见同书《诠赋》、《明诗》等文体论篇章的影踪。这绝非简单的摹仿。按《文心雕龙》是一部集前代大成而开后世先河的中国文章学著作。它的根本精神是,在传统(见《原道》以下三篇)与时变(见《时序》以下四篇)所构成的场域中(大系统),阐发:以心性一元为根本,以意辞征实形虚,主从互摄为核心与红线,以通变定势为枢机的,对文学依托于一定文体的文学语言形式的,与时推移、复古通变的不懈追求。它的许多观念,实际上已先期地与现当代西方文论,尤其是文学的语言形式批评有暗合处,却又体现了鲜明的民族特色,而绝非任何一种西方美学文艺学理论所能牢笼。我不敢说继中对《文心雕龙》的看法与我相合,但从此稿,尤其是新成的上卷的论析中可以看出他对以《文心雕龙》为杰出代表的中国古代文论的谙熟与深刻理解。他那看似西化意味甚浓的《文化建构文学史纲》,在骨子里却体现了希望建构起中国民族文学理论体系的艰苦努力并自始至终贯穿着民族的文学思辨的红线。也因此他对诸多西方文论采取了不主一家,兼取并融的态度。王元化先生在论中西会通时曾说,不能以西学为坐标,而应当以之为参照系。我想继中此稿正体现了这一科学精神。

继中此稿的具体论述也尤多精彩,比如上卷对魏晋至盛唐文人心路及其相关历史文化因素的论析,下卷对中唐后雅俗文学交流态势的阐发等等都很有创意。囿于篇幅,不能列述详论,而只能略挈其主要理论架构如上。当然,任何理论体系都如同框架,框住了理论视角所及的部分,而可能失落了其他一些也较重要的部分。对于继中的理论架构,我也有几点意见供参考。

我完全同意以中唐为界划分魏晋至北宋文学发展史为两大阶

段,且十分赞许这种打破朝代界划的勇气。然而其中又以“士族文学”与“世俗地主文学”为两阶段文学特质的标志,并以士庶之判与雅俗之分作大体对应的联系,却颇可商榷。这里尤须注意二点。其一,士族与庶族的对待,虽是特定历史阶段的现象;然而它所体现的贵族与寒族相对待的实质,却是通代的一般现象,而此稿所举士族、贵族(似指唐代新士族)、世俗地主(似指庶族),又处于一种推移升降的流动形态之中。反映于文化层面,私以为贵族文化与寒族文化的对待交流,是与文质对待,雅俗对待一样贯串于整个中国文化史、文学史的,似当放在同一层面来综合考察。同时贵族文化,它通常衍化为中朝文化氛围而以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与在野文化氛围相对待。同样的,这也是一个流动不居相互渗透的历史过程。其二,似应注意,雅俗对待与士、庶对待不存在对应关系。前者是通代现象,后者是阶段现象。而“俗文化”之“俗”与所称“俗族地主”之“俗”,又非同一概念。士、庶,贵、寒,对“俗文化”的吸纳是不分前后彼此的,而他们的创作又在总体上属于雅文学的范畴。比如鲍照、李白的作品,尽管多吸纳俗文学营养,但仍属雅文学,但如果以之为士族文化的重要代表,总感到牵强。

前已说明,以文化与文学作为互动同构的系统与子系统,且以文学为经济等社会因素与文化的中介,是富于建设性的。然而,此“中介”应当只是社会因素宏观地反映于文学的中间形态,它在创作之前业已存在,而不能直接成为文本的内涵。继中在“中介”问题上的表述似乎存在着一种矛盾。在文字上,“中介”的界义如前;但在首章表列的文化与文字互动同构的图式中,他其实是以所称“情感结构”为文化与文本(还有所称“客观世界”)的交汇点的。私以为后一种相对而言更接近“中介”的事实。然而情感结构尚不足以反映问题的全部。私以为《文心雕龙·体性》篇所称凝铄了才、气、学、习的“成心”,亦即作者天赋与后学浑然一体的个性化的心性——它在文学创作中通过即时即地的意(情意)辞主从互摄的活动来体现——方是真正意义上的中介。继中的上述矛盾似乎反映了在他的总体观念中,对于文化驱动(目的)与文学样式自身演进态势的关系,群体意识(或集体

无意识)与作者个性的关系,一般趋势与创作情境的关系,意与辞的关系等等,都过于强调了前者而对后者的重视略嫌不足。在我看来每种文学样式都有其发挥自身潜能的内在冲动,而“成心”各异的作者则是开掘此种潜能的最活跃的因素。他们每一次即时即地临境结构的创作所形成的文体与个性风格混一的文本,都逐渐地改变着某种文学样式,而往往在特定的机缘与天才作家的手中,量的积累终于引发质的飞跃。由此而言,相对于本位的文学,文化,诸如政治、哲学、思想、习俗、艺术等文化因素仍然只是文本的外部的因素,即相对于创作主体的客体。继中在这一问题上似乎存在又一种犹疑,在他的表述中“客观世界”与作为文化温床的“经济基础”是作为并列的二元来看待的,而对于文化也尚未有较明晰的界义。其实对于创作主体而言,客观世界本来既包括自然的,也包括人文的。这些都是可以再进一步探讨的。继中的观点启发了我对中介问题的认识深化。似乎存在着两个相关层次的中介,即继中所主的“文化中介”——第一层次,与我所主的“成心”中介——第二层次。“疑义相与析”,也许二说可以互补短长。

以黑格尔正一反一合的思辨模式与“通变”相联系也待再榷。私以为通变的内含远非正反合所能包容。简言之,通变在刘勰的创作论系统中并非一个孤立的概念。它首先与“定势”相对待,又上连“体性”、“风骨”的对待并探赜于“神思”,下接“情采”与“熔裁”的对待而引发以下论文病、文术诸篇。从而描述出以成心一元为本,意辞主从互摄的意匠作用为红线的,从诗思发动到情经辞纬,结采凝辞于一定文体的文本形成的创作全过程,当然这个小系统还与文统、时变所形成的历史文化场域相联系而变化万端。以正反合释通变,迫使继中只能择取若干文学因子如质文、雅俗的代变来展开论述,而其实这些还不足以较全面地解释复杂的文化现象,特别是以心体活动为主体的文学现象的。我总感到继中原本相当宏阔的文化与文学关系的视野被正反合狭窄化了。具体论述中偶见的牵强处,盖源于此。我还认为每一种文学现象形成的原因往往是多元的,而诸多因素的比重位置也因具体情境而不同,有时,甚至外部因素也会成为主要动因。

因此,恐怕很难用任何一种哲学思辨模式来贯通远为复杂的文学史流变。至少在目前阶段,还应更多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以上三点为一孔之见,未必的当,对于这部富于建设性的文学史纲兼文学理论著作来说,也只是吹毛求疵。愿与继中共勉,也希望引起进一步的讨论。

序 二*

陈伯海

继中同志《文化建构文学史纲(中唐—北宋)》一书终于问世了,我为他欢庆鼓舞。据我所知,他在这部书稿上确实倾注了大量的心血。1987年初,我们在一次学术会议上初次相遇时,他对书稿已有了完整的构想。此后几年间,我们见面虽少,但通信里不时谈起这部稿子,从他发表的一系列论文中我也了解到书稿的某些梗概。我曾答应为之推荐出版,始终没有成功。所以当继中同志告知即将梓行的消息,并嘱我写几句话,我也就打破历来怕给人作序的顾虑,勉力谈一点读后的感想。

坦率地说,对于“文化建构文学史”这个名称,乍听之下,我感到有几分生涩。好像还建议过继中同志换个书名,他没有听从,他是有道理的,因为这一提法概括了他对文学史的基本认识。在他看来,任何时代的文学现象都不是孤立自足的,而是整个社会文化构型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和总体文化构型之间存在着互涵互动的关系。至于文化构型也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随着经济基础和社会生活方式的变迁,处在逐步转型、不断建构的过程之中;于是文学史就成了文化建构的一个方面,它受建构过程中的整合作用所驱动,而又以自身的变革参与了文化的建构。这样一种双向同构的运动,便名之曰“文化建构文学史”。

* 此序系《文化建构文学史纲(中唐—北宋)》(即本书下卷旧稿)之原序,该稿由海峡文艺出版社1993年5月出版,三秦出版社1994年8月重版,现经修订编为下卷。

依据这个观点,书稿着重论述了中唐至北宋这一段文学的历史发展,作者认为这是中国传统文化构型的一个重要转变时期,即由士族地主文化构型向世俗地主文化构型的过渡。全书从剖析唐中叶以后土地制度的变革和社会阶级关系的变动入手,具体论证了这一变化如何促进科举制度的沿革和政教一体化的趋向,并由前者带动世俗地主的知识化和文学由雅入俗再化俗为雅的回旋,更由后者造成儒学的复兴和伦理入主文学的局面,而两方面的演进则都归结为文学创作中新规范、新图式的构成。就这样,继中同志用他独特的文学史观理清了这一段文学演变的线索,又通过文学历史轨迹的综合考察生动地演示了他的文学史观。

当然,对于书中的论断会有不同意见,甚至它所表达的基本观念也可能引起商榷,但我相信,认真读过这本书的人,是能够从思想方法上得到某种启示的。

长期以来,我们的文学史著述形成了固定的格套,即首先叙述一下社会背景和文学概况,然后就一个个作家分别作介绍。前面的背景教材由于是总括性的,往往不贴切具体的文学现象;而后面的作家介绍又多拘囿于个别状况,容易游离出社会历史潮流之外。这样一来,前后两部分的配置,就好比在一个大镜框里嵌进了一幅幅小照片,镜框做得再精致,也只是照片的外表装饰,不能赋予其内在的生命。于是我们所见到的文学发展图景,便被割裂为零散的板块,不复构成相互联系、相互转化着的活生生的整体,这应该说是文学史景观上的一大缺陷。

本书的特点正在于超越了单纯从事作家述评的界限,而把中唐以至北宋的文学运行作为一个流程,更将文学史的运动纳入总体文化建构的框架内加以审视,找出其外部和内部的动因,进而把握住它随同文化建构的步伐一起波动震颤的脉息,这就使各种分散的文学现象得以串连、组合起来,而文学与社会经济、政治、思想文化诸因子间的交互作用也才能充分揭示。试看书中用由雅入俗再化俗为雅的回旋来归纳唐宋文学风气的嬗递,以及从政教一体化的要求推导出士大夫人格机制与文学倾向的转变,特别是末章所展示的在宋人期

待视野作用下,杜甫被选择为诗歌典范及其由“诗史”到“诗圣”以至最终蜕化为内观照的“山谷模式”的过程,更是写得丝丝入扣,令人拍案叫绝。这除了归功作者学植深厚外,其得力于识见的超卓是毋庸置疑的。

众所周知,史家传统有史学、史才、史识之说,而史识尤为难能可贵。中国历史之父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里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相标榜,说的就是史识。后来的正统史家大多欠缺司马迁的识力,所著史书不免下《史记》一等。这个道理对于文学史研究也应该是合适的。遗憾的是,古典文学领域多年养成的习惯是重史料而轻观念,甚至有以理论探讨为空疏无学的偏见,这不能不影响到文学史的著述,往往满足于杂陈事象、毛举细部,难以从大处着眼,把握其内在贯通的精神血脉,而太史公的期望也便落了空。近年来,人们对于这方面的缺陷开始有了认识。关于文学史观的讨论中,鲜明地提出文学史研究的当代性和主体性问题,实际上就是主张用今人的历史观念去烛照过去的历史,使死去的历史重新获得活力,成为当前理论建设的有用材料。我以为,在尊重历史客观性的前提下来看待这一要求,是无可非议的。与此同时,我们确也见到若干种有识见、有理论的文学史著作(多属断代史),能够透过对现象的缜密分析,逐步显示出其深藏的规律性,读来赏心悦意,本书即其中之一。这类著述并不匮乏史学、史才,而突出的优点则在于史识。尽管史识的发展完备有待于艰苦的锤炼,但努力用宏通的识力来熔铸史料,驱遣史笔,将历史研究提升到理论概括的层面上来,仍然是建设真正具有科学意义的文学史的必备条件。这一点我是确信不疑的,愿与继中同志共勉!

1992年10月于上海

目 录

序一	赵昌平(1)
序二	陈伯海(8)

上 卷(196 ~ 755)

第一章 士族文化的建构与文学	(3)
第一节 蔓状生长的文学史模式	(3)
“文质代变”/“雅”与“俗”/文化与文学的同构运动/蔓状生长	
第二节 文化贵族与贵族文化	(21)
士族文化构型/士族文化的基本特征/文化贵族/盛唐文化之变异	
第二章 生存焦虑唤醒文学	(32)
第一节 情志的离合	(32)
党锢/追问生命的古诗十九首/“雅好慷慨”/咏怀:理念与情感的双头马/志怪	
第二节 人生诗意化的追求	(54)
儒道会通的文化精神/“志尚清虚”/“山川依傍田园”/陶渊明的审美超越/谢灵运山水诗的范式意义	
第三章 文学的“独立战争”	(72)
第一节 意象化:培养独特的诗性思维	(72)

“矢志之作”/比兴的进展/“巧构形似之言”/直寻与兴会/事典的意象化

第二节 律化:酿造文学独特的语言形式…………… (89)

“丽”的精神与诗赋互动/“新变”的文化选择/乐府与赋的合流/审美理想的提出/齐梁咏物诗

第四章 多元和谐的盛唐气象…………… (110)

第一节 士的回归与情志合一…………… (110)

河朔贞刚之气/士的回归/《感遇》:抒情之魂/“胡心”·任侠/李白

第二节 “声律风骨始备”…………… (130)

简约与实用/“以少总多”/胡乐、胡舞与诗歌/“神来、气来、情来”/杜甫

下 卷(756~1126)

第五章 嬗变中的文化构型…………… (151)

第一节 两种文化构型的交接处…………… (151)

“中唐”之“中”/两税法与市井文化/谱谍更订与士庶混一/“牛李党争”/历史的课题

第二节 科举:文化建构的杠杆…………… (159)

“唐以诗取士”/儒学与皇权的联姻/学校、科举、文化/世俗地主知识化及其效应

第六章 世俗地主知识化运动中的文学…………… (170)

第一节 由雅入俗的新浪潮…………… (170)

浅切俗艳与尚怪/“光阴听话移”/重感官的彩绘笔触/“诗余”/“凡有井水处皆歌柳词”

第二节 化俗为雅的回旋运动…………… (189)

西昆体:第一次雅化运动/“跳出坑底又掉进井里”/绚烂归于平淡/词的“本色”

第七章 反思转入内省过程中的文学	(207)
第一节 一体化及其个体规范化的要求	(207)
儒学转向/古文运动的实质/文章务本论/宋人眼中的唐人/伦理入主文学	
第二节 自我调节机制与文学二元	(222)
“白氏”现象/文学之二元/“漠然自定”/韵外之致/情感“走私”	
第八章 文学的“再自觉”	(244)
第一节 “诗史”到“诗圣”的整合过程	(244)
“诗史”的特质/进入交流系统的杜诗/宋人的期待视野/寻找时代的最高典范/王安石的铁腕	
第二节 内观照的“山谷模式”	(270)
“请杜就范”/以故为新/千家注杜/宋诗话/士大夫审美趣味及其危机	
结 语	(293)
跋	(295)